

农村的出路

“回不去的农村，融不进的城市”，是很多农村青年在城市里面临的尴尬与悲伤。

其实，问题本身远远超出了农村范畴。比如，农民打工人如何真正成为城里人，这是城市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。企业如何进入农村投资，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问题。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，这是城市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。

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村的中国问题，后者是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。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农民与农村的出路。

01、农民与自由市场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国农村是一个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社会。

分田到户后，粮食产量较之前有所提高。当时的农田面积、肥料、农药、种子及耕种技术变化不大，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。这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作用。

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记得，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吃饱穿暖，而是没有现金，一个家庭要拿出几百块钱来都颇为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市场。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，而不是货币经济。即便有些粮食、蔬果等劳动剩余，也没有渠道和市场销售。同时，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剩余，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吸纳。

为什么会有劳动力剩余？

由于没有启动自由市场，农村劳动力只能扎堆农业。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，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规模固定与技术稳定的农业领域（如一亩地），人均产值就越低。所以，外出打工，就成了当时农村青年的唯一出路。

通路，启动了自由市场。

当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是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。什么意思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修路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。乡村与城市通路，信息开始互通，供给与需求自发性地形成，进而促成交易与价格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，自由市场启动。

信息，或者叫思想市场，是自由市场启动的第一步。当时，农村观念保守，信息不通提高了心理的交易成本。港台文化通过影视的方式进入乡村，一些长辈不希望青年外出打工“学坏”，或者遭遇资本家的剥削和流氓的欺负。但是，道路修通后，更多真实的信息反馈回来，很多人开始外出打工，出现了第一批“外来妹”。

在南方，早期致富的乡镇和乡亲，都与早期通路直接相关。比如，湖南、广西、福建和江西都紧邻广东，但是湖南人在广东这边致富更早一些。除了湖南人勇于闯荡的精神外，湖南与广东通铁路更早些是关键。江西开通珠三角的铁路已是1997年的事情了，高速更是2004年才通车。

通路后，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力市场，而不是农产品市场。

乡亲传帮带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、创业的主流模式。这与南方的宗族社会有很大关系。通常，最大胆的几个青年提着一袋衣服跑到珠三角进厂打工。一年到头，赚了一点钱回家过年，他们通常会购买一些时尚的衣物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一年打工赚得钱实在太少，但是对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农村来讲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年后，这几个人会带一些乡亲一起去打工，在同一个厂，或介绍类似的工作。

如果这个工厂或这个产业效益好，如深圳的电子、东莞的服装、顺德的家具，会有更多的乡亲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参与进来。这时，原始的乡村信用体系发挥了作用，宗族文化与乡亲信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，相当于降低了交易费用。

率先致富的往往是那些具备“企业家才能”的打工者。通常，工厂订单持续增加，工厂老板一时无从拓展工厂，会支持个别“能干事”的工人去外面兴办一两个外协厂。外协厂，开始时规模都很小，更像家庭小作坊，负责的工人往往会找几个老乡过来一起干。随着原始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，这类外协厂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打工人成为了小工厂主。同时，越来越多老乡加入到这些工厂。这些外协工厂有个别在精明的工厂主带领下可能做大。

这种模式，像制造业的“航母群”。原始工厂是一个超级航母，周边围绕着一群外协工厂。这种模式在对外贸易领域很常见。进入千禧年后，中国的外贸订单持续扩张，制造业的航母群“水涨船高”。航母规模越来越大，这个产业集群就越来越大，致富的工厂主也就越来越多。

过去一些年，不少内地政府承接沿海工厂，在广州、深圳设招商办，举办招商会、地方商会，邀请外出创业成功的老乡返乡投资。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不小的产业集群。比如江西有一个城市专门为顺德家具提供代工，湖南一个城市为珠三角电子提供代工。这些工厂多数是成功的企业主返乡创建的。新一代青年农民在距离乡村不远的工业园打工。这是过去南方乡镇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。

在过去四十年，农民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“廉价劳动力”。但其实，农民是中国自由市场启动的关键力量。在企业家群体中，有早期的港商、台商，也有后期的欧美投资者，还有九十年代下海的官员，以及千禧年之后的知识创业者，但是最不能忽略的是农民企业主。

在八十年代自由市场启动初期，神州大地只有农民群体具备“企业家才能”，可能转型成为企业主。因为农民是唯一没有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的群体。我们在讨论，苏联解体30年，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形成自由市场？因为没有企业家群体，苏联将绝大部分人纳入了计划体系，耕耘了几代人，消灭了竞争意识、创造能力和冒险精神。

中国的情况存有差异。我们今天讨论东北衰落、经济南移，为什么？东北是中国计划体系最为完整的地区，改革开放后，东北缺乏启动自由市场的群体。整体上，南方的市场启动要优于北方，市场发达程度要强于北方。这是南强北弱、经济与人口南移的根本原因。南方的自由市场启动靠谁？

靠农民。南方的计划体系要弱于北方，尤其是广大南方的山区农村。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只实施了短暂的时间，南方农民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，他们当年被贫困所迫渴望外出创富。八十年代自由市场打开后，农民背井离乡，进城打工，搞货运，卖快餐，卖水果，几乎无所不干，敢想敢干。像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中的陈江河和骆玉珠，中国市场上可以找到无数个这样的农民企业主。他们中每个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，是中国的商业历史上最令人感慨的故事。当然，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在工厂里打工赚钱。

400年前的欧洲，脱离城邦的农民、流民及“贩夫走卒”启动了近代自由市场。40年前，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，农民启动了中国的自由市场，然后才有下海潮、外资潮。

浙江农村究竟有多富？

02、农民与城市文明

但是，中国企业主及工人，他们的竞争力又是脆弱的。脆弱性来自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市场方面，一个是非市场方面。

中国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具有很强的依附性。他们对超级航母的依赖性很强，超级航母又依赖于海洋。这些年，国际贸易环境不如2008年之前，超级航母的吨位在下降，依附于航母生存的外协工厂生存变得艰难。一旦超级航母消失，大型工厂倒闭或整体迁移到东南亚，整个园区与之配套的上下游工厂都面临灭顶之灾，大量适合农民工人的就业岗位也就随之消失。这种例子在近些年并不鲜见。

如今，我们在新一代农民或打工工人身上，很少听到像陈江河和骆玉珠那样的故事。一方面原有的国内外市场趋于成熟和饱和，进入门槛更高，外协订单减少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，这种模式的创富机会在减少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享受了欧美世界技术迁移的红利，农民工人及农民企业主也是如此。如今农民工人面临的困难，其实是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迁移红利衰退的问题。依附于超级航母生存，本质上是依赖于超级航母转移过来的技术与设备，大量外协工厂缺乏真正的技术，也缺乏技术改进的动力。除了引进新设备外，新一代农民工人较上一代农民工人，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并未领先多少。创业机会越来越少，又无法赚取技术性工资，这让新一代农民工人不太愿意留在工厂。

他们更愿意去当骑手送快递，送外卖，跑滴滴，安装电信网络。为什么？因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，他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要强得多。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网络交流，使用手机接单。尽管被算法锁定，但新一代农民工人更希望以这种方式谋生，并渴望穿行在城市大街中寻觅到商业机会。一位开滴滴的司机跟我说，他后悔自己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工厂，认为那是愚蠢的行为。司机说，他开滴滴后赚得钱比之前更

多，也获取了更多的信息。当然，这不是骗各位去开滴滴的故事。

中国农民企业主及工人的脆弱性还来自非市场性的城乡壁垒。

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，过去中国农民状况得到改善，靠什么？靠他们启动的自由市场。路修通了，他们进城打工创收，之后返乡创业。同时，农民把本地的水果和蔬菜运往城市销售。

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。这个过程，技术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就因为自由市场启动，人流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，市场重新配置了资源，财富就增加了。

这是农民致富的经济学逻辑。

但是，现在农民、农业及农村的发展问题，正是背离了这种逻辑所致，具体来说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。

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城市？什么是城市化？城市不等于产业聚集地，也不等于楼宇聚集地。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换体系，而维系这一体系需要一个高效的公共资源体系。这个公共资源体系是城市化的文明成果。

户籍曾经是中国农民与市民的身份识别码，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门槛。过去，对进城打工的大部分农民来说，他们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，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洪流中的一粒沙子。

03、农民与农村出路

这是我要讲的城乡二元经济的另一面，那就是农村的市场隔离。

过去，城市之所以兴旺，是因为启动了自由市场，信息、资本与劳动力的流通禁忌更少。农村之所以衰落，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资源充分流通的市场。农村也有自由市场吗？

其实，农业不是传统行业，农村不是落后社会。

更准确说，产业与能源一样，没有新旧之分，传统与现代的区别，只有效率高低差异。美国、日本的农业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，美国的农村不仅有自由市场，而且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场。世界上最先进的种子公司、化工公司为农场主提供种子和化工技术，先进的农机制造工厂为农场主提供耕种设备，农产品销往世界各地，同时形成庞大的期货、信贷与保险市场。这就是美国农业的自由市场。

在美国，农业就业人口已经少之又少，但他们支撑着全球粮食市场。美国的农村也不再是落后的社会，美国农民平均收入并不低，乡村公共资源也相对丰富。可见，农业也是可以赚钱的，农民在乡村也可以过得很好，尽管农民的比例不高。

再看中国，中国一些相对富裕的农村，也是自由市场发展比较好的地方。比如一些具备旅游资源的农村发展成为了特色小镇、生态乡村、民宿乡村。这就是中国乡村的旅游市场。

但是，整体上来说，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市场隔离，阻碍了人才、土地和资本进入，从而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，也阻碍了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。这是为什么？

举个例子。如果你在城里创业赚了钱，在城市落户安家。这时，你想回乡投资，购买一大片土地规模化养殖或种植。这种难度是很大的。因为从制度上，你是无法实现的。乡村的土地是集体土地，落户城市的你失去了购地的资格。

过去，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，但如今这一土地制度边际效用正在递减，集中在土地流动性问题上：

一是限制了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。

土地流动性受限，土地被碎片化，无法形成规模效应，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派上用场。缺乏规模效应，农民也不愿意在土地上多投入，由于土地肥力递减，影响农业收入的增加。

反过来说，如果土地流动性问题被打破。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耕种，也不留在农村生活，他愿意将土地变现，如贷款或出售，以在城市购房或者作为创业本金。同时，一些愿意耕种的人接手，形成规模效应。这就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也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。

二是阻碍了资本、技术与人才进入农业，扎根农村。

农业是一个周期性长的风险行业，大规模经营，需要大资本投入“深耕细作”。如果土地产权流转受限，确权成本高，那么相当于放大了投资风险。

有人提出，土地承包制度也支持土地流转，不一定非得产权买卖。确实，在山东、湖南，我们都看到大量外地农民承包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和蔬菜。其中，一些形成规模效应，使用了大型农业机械。

但是，这种效益普遍都不高。比如，在湖南岳阳地区，河南人大量承包当地土地，但人均收入不高。反过来说，但凡效益高的承包种植，都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
我举个例子。在南方一个地区，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。近些年，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。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，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，果树产量迅速翻倍，质量也大幅提升。虽然产值规模扩大，但是由于水果质量提升，价格没有下降多少，避免了“谷贱伤农”。这个地区的农民通过种植技术输出致富。

但是，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，问题主要来自土地产权。由于土地无法购买只能承包，产权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，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，马上要求毁约，设置各种路障，强行收回果园。他们一次改造土地，肥力可以维持几年，投入资本不少。如果当地农民毁约，他们就血本无归，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，眼睁睁地看着果树亏本。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不是没有技术，没有资本，但是当地农民、承包农民和社会福利都受损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过去四十年，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没有形成一个充分的流动性市场。土地的流动性受限，技术、资本和人才进不了农业和农村。农业的进步、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，就无从谈起了。所以，乡村的凋零与衰落，不是城市化的问题。只要城乡二元经济打通，城市与乡村可相得益彰。

近些年，高层在考虑推进土地制度改革。土地改革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？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。国有土地行不行，集体土地行不行？像新加坡的淡马锡、德国的大众汽车都是国有的，但是效益非常好。在自由市场中，个人产权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。反过来说，国有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，想要产生高效益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极高的公共治理能力。

如果当地农民毁约，承包商可不可以告他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交易费用很高。乡村治理问题让更多人望而却步，当地人依仗集体的力量可以有更多办法“搞”外地承包商。目前良莠不齐的乡村治理水平，难以支撑集体土地制度发挥效率。

我们需要警惕制度抬高交易费用。当年深圳尝试搞土拍，让城市国有土地开始流动。但是，单一的土地供应，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，集中反应在高房价上。在集体土地制度中，土地由本地农村集体控制，价格机制扭曲，同样大大抬高了交易费用。

土地个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，形成更加高效的土地市场，但是否催生两个问题：一是农业安全，二是农民失去土地。

农村的土地，让资本、技术和人才进来，农业产值才能提升，农业技术才能提高。土地流转与守住耕地红线并不矛盾，只是会增加政府的管理难度。但这个管理成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。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，农业技术是根本保障。

关于农民的生存安全问题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。我想分为两个方面来看：

一是让所有人建立“成人思维”，而不是婴儿思维。所谓成人思维，对自己的独立决策负责。个体的独立行为是人类文明的基石，独立行为包括自由决策，还包括对自由的后果负责。城市的房子是个人的，也可以交易，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市民失去房子？交易房产是他们的自由，他们也必须为这个自由承担责任。中国农民到处奔跑闯荡，没人给他们兜底，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。二是考虑到社会风险，可以分步骤推进，不动宅基地，先在耕地上推进改革。

其实，这两个问题并非改革考虑的关键，关键是土地征收成本问题。

总之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，启动自由市场，是农民增收的可靠逻辑。我们遵循这个逻辑，其实就是遵循经济规律。农村的市场障碍其实更大，下游的粮食收购，上游的化肥研发、种子研发、化肥进口，需要更加充分的竞争与流动。

农村的问题，根本上还是如何启动市场的问题。当年，农民进城打工和创业启动了城市自由市场。如今，该启动农村市场了。